



● 陈文忠 著

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

安徽大学出版社





陈文忠 著

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



安徽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学多维研究丛书

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

陈文忠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学多维研究丛书
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
陈文忠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码 230039)

安徽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 字数 275 千字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3000 册

责任编辑 杨应芹 封面设计 孟献辉

ISBN 7-81052-499-7/I·17 定价 16.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序

1989年,刘学锴先生和我在《谈谈〈李商隐诗歌集解〉的编撰工作》一文中说:

本书中的“笺评”一项,汇集了自宋代至近代众多学者对义山每首诗的感受、理解与评论。从中可以看到不同时代、不同文艺观、审美观的人们的眼光。有商讨切磋,也有争论辩驳。所涉及的内容,从考证本事、叙述背景,到疏解诗意、阐明大旨、论文谈艺……我们在收集整理时,感到如入琼林宝肆,开拓了眼界和思路。像《锦瑟》、《无题》诸篇……的会笺会评,尤为精彩纷呈。把这些材料贯穿起来,几乎就是一首首诗的研究史。它不仅给欣赏、研究义山诗提供了多方面的参考,而且对研究文学史、文学批评史、诗学、美学也不无启发。

——《书品》1989.2

我们当时所以要说上这样一段不算太短的话,不仅是由于《李商隐诗歌集解》中的会笺会评部分对于理解、欣赏、研究李诗有益,同时还由于觉得它的价值,超越了义山诗阐释范围而可以给相关学科提供参考。但它后一方面的用途,可能很容易被忽视。我们不免感慨,故而多说了几句。

基于研究义山诗的实际感受,推而广之,有关中国古代诗歌研究,我想到两个问题:一是各种文献资源有待开发。历代大量的诗话、选本、注本、评本,乃至散见于各种文集、笔记中有关资料,至今未得到全面系统的整理,更谈不上充分利用。二是需要改进研究

方法。7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古代文学研究虽然成绩可观，但基本上是依靠传统研究方法取得的，整体格局没有太大的变化。为取得更为丰富多样的成果，体现我们时代的眼光、水平和特色，需要结合运用新的方法。由于经常考虑以上两个问题，所以我对陈文忠同志从事接受史研究，一直寄以希望。最近，他的《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一书将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新著问世，显然会推动学界对有关文献资源的重视与开发；同时，它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拓展了新的视野，增添了新的研究方法。

作者认为：“诗歌创作和诗评、诗话写作的双线并存，互为推进，是中国诗歌史的独特景观。”基于此，这部新著吸收西方接受美学理论，结合中国诗史文献资源和整理研究工作方面的实际情况，建立了富有特色的接受史研究架构。书中关于接受史研究几个方面内容及其意义的论述，关于接受史研究对于文学史研究、诗学理论研究，以及对于诗歌创作意义的论述，让人感到包蕴丰富、新颖透辟。比如，关于阐述史的论述，就使我受到启示。我们在为义山诗作集解过程中，发现《锦瑟》、《无题》、《梦泽》、《嫦娥》、《重过圣女祠》、《登乐游园》（五绝）等诗所含的意旨或所具有的启发意义，都不是从一个方面可以穷尽的。历代许多注家、评家尽管见解分歧，但不少意见都可能是从某一点上对诗的意旨有所发明。据此，我们提出在义山诗研究中应该汇集已有成果，融通众说的主张。这是于实际工作中得到的朴素具体的认识。陈文忠同志则从阐释史的角度作了论述：“文学作品作为一个图式化的审美结构无不潜藏着一个多元的‘意义整体’，这一‘意义整体’不可能在第一次阅读时向读者全部开放……‘意义整体’的具体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只有在理解的历史进程中才可能逐步展示作品的全部意义。”“今人的重新思考和再阐释，并非意味阐释史从此终止，它也只是无尽阐释史的一个环节……优秀作品是读不尽说不完的。”这可以说从

现代阐释学角度把许多学者从事古代诗歌注释笺析工作的经验感受作了非常切实的理论阐发。中国古典诗歌中大量存在着具有丰厚意蕴乃至多义性的作品,这种从接受史角度引出的新的阐释观念,对推动古典诗歌阐释与研究是有益的。

本书极其注重文献资料与理论分析的有机结合。作者指出:“学术研究中,资料的取得与运用,决定研究品质的高下;掌握了全面可靠的资料,方可提高研究水准。”认为“接受史研究过程包括两个基本环节:其一,文献学意义上史料的系统整理;其二,批评学意义上接受历程的现代理论阐释。”这种认识有助于“避免诗论之空言与诗作实事相脱离的弊端”,同时把接受史方法引入古典诗学的研究,使诗话等文献资料的价值,从新的角度得到审视与认定。“历代诗话实是一部内涵丰富、有待整理的‘历代诗歌接受史’,它具有多层面的学术价值:从诗人或作品入手考察研究便可写成一部著名诗人的接受史或经典作品的阐释史;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探索,则会发现它在诗学研究上有着不同于单纯着眼概念范畴排比阐释的独特价值:深化旧题,解决难题,发现和提出新的论题。”本书在许多“单个作品”的微观接受史研究中实践了上述理论。有关唐人金昌绪的《春怨》,通过历代大量接受材料的排比分析,对《艇斋诗话》中引而不发的所谓“古人作诗规模全在此矣”,进行破译,论证《春怨》在诗法意义上具有形象的圆整性、诗境的含蓄性、叙述的曲折性、艺术的原型性、风格的古朴性等特征,从而对《春怨》的艺术成就和中国诗评的基本审美原则作了充分的阐发。再如从《孔雀东南飞》、《长恨歌》的接受史中勾勒出古代叙事诗理论的潜体系;从《诗经·陟岵》和唐人苏味道《正月十五夜》等篇的接受史研究中得出中国所谓“诗祖”、“诗胎”近似于西方文论中“原型”、“母题”的认识;从有关陶潜《饮酒·其五》一百多条评论的梳理中看到“历代诗评关于陶诗风格在历史阐释中所包含的美学深度和理

论逻辑”，并进而指出“寓细密的理论分析于历史阐释过程之中，是中国古代文学风格批评的一个重大特征”，等等，都充分说明作者是把历史文献资料的掌握和理论的探讨分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正因为有了这种结合，所以本书始终给人一种从深远的历史回顾中，把视野引向更为开阔、更为明晰之境的感觉；同时也使文本审美阐释与诗学理论探索有机地统一起来了。

在“单个作品”微观接受史研究的基础上，探索接受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也是本书用力的一个方面。首先，根据古典诗歌“原始接受史”的实际，把接受史研究具体区分为效果史、阐释史、影响史和诗学沉思史四个方面，可以说是对西方接受美学的发展，全书的逻辑架构正是赖此得以建立。其次，在接受史研究的基本理论方面也结合微观研究作了有益的探索。如结合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柳宗元《南涧中题》等篇的阐释史，认为接受史上的“第一读者”并不一定是第一个接触到作品的那位读者，而是指“以其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阐释，为作家作品开创接受史、奠定接受基础，甚至指引接受方向的那位特殊读者”，这实际上是回答了具体作品接受史研究的起点和上限问题，是对接受理论的补充和丰富。

摆在我面前的是作者从事接受史研究的第一部专著，但书中多处指出接受史范围内还有许多有待进一步开发的广阔的学术领域，我们期待着作者再有新的著作问世，把中国古代诗歌接受史研究继续推向前进。

余恕诚

1998.7.2

目 次

序.....	余恕诚	(1)
前言.....		(1)
第一编 接受史研究的理论方法		
一、诗歌接受史研究的方法		(9)
(一) 接受史研究的基础.....		(9)
(二) 效果史研究		(14)
(三) 阐释史研究		(17)
(四) 影响史研究		(21)
(五) 接受史方法与古典文学研究		(26)
二、接受史与古典诗学研究.....		(29)
(一) 接受史:面对经典的诗学沉思.....		(29)
(二) 接受史与诗学观念考察		(34)
(三) 接受史与诗学理论建设		(38)
(四) 接受史与诗评方法反思		(41)
三、审美接受与文学作品的创造.....		(48)
(一) 创作不是独立的艺术活动		(48)
(二) 阅读是创作的直接目的		(50)
(三) 读者是创作的潜在合作者		(55)
第二编 经典作品的审美阐释史		
一、“第一读者”的接受史意义.....		(62)

(一) 接受史上的“第一读者”	(62)
(二) 苏轼对唐诗的“发明其妙”	(66)
(三) 苏轼与唐诗的接受争端	(74)
二、唐人“五绝之冠”的接受境遇	(83)
(一) 宋人独赞诗中之画	(83)
(二) 明人评说钓雪蓑翁	(86)
(三) 清人始见寂寞诗心	(89)
三、《长恨歌》接受视野的历史嬗变	(94)
(一) 选家沉默,评家毁多于誉	(95)
(二) 诗旨与诗艺的双重责难	(97)
(三) 推为“古今长歌第一”	(102)
(四) 叙事诗接受的新阶段	(106)
四、《琵琶行》诗化阐释的历史行程	(111)
(一) 唐代:胡儿能唱琵琶篇	(112)
(二) 两宋:琵琶亭前说司马	(114)
(三) 明清:琵琶有曲播新声	(121)
(四) 余论:琵琶为何说到今	(127)
五、《如梦令》阐释史的双线演进	(130)
(一) 绿肥红瘦语嫣然	(130)
(二) 短幅藏曲圣于词	(133)
(三) 脱胎化质胜须眉	(138)

第三编 艺术原型的创作影响史

一、“第一印象”的恒久光辉	(143)
(一) “第一印象”与艺术原型。	(143)
(二) 《正月十五夜》与宋人元夕词	(147)
二、唐人思乡诗的原型与创变	(152)

(一) 《陟岵》: 骊旅行役诗之祖	(152)
(二) 思乡诗的三大抒情模式.....	(157)
三、古代贫士诗的历史流变	(162)
(一) 贫士与贫士诗.....	(162)
(二) 贫女自伤与贫士写照.....	(168)
(三) “贫士”“贫女”的并行发展.....	(173)
四、从《枫桥夜泊》到《涛声依旧》	(182)
(一) 诗里枫桥独有名.....	(183)
(二) 谁如张继善吟哦.....	(185)
(三) 好诗谁嗣唐张继.....	(192)

第四编 面对经典的诗学沉思史

一、《春怨》阐释史与抒情诗法则的沉思	(201)
(一) 《春怨》阐释史描述.....	(202)
(二) 《春怨》的诗法意义.....	(204)
(三) 《春怨》阐释史的启示.....	(213)
二、《江亭》接受史与哲理诗审美特征的探索	(215)
(一) 《江亭》接受史的诗学主题.....	(215)
(二) 理趣: 从禅学到诗学	(219)
(三) 理障·理致·理趣.....	(223)
(四) 散联警句和暗与理合.....	(231)
三、《孔雀东南飞》接受史与叙事诗理论的思考	(236)
(一) 叙事诗观念的历史形成.....	(236)
(二) 长篇诗在中国何以不发达.....	(240)
(三) 叙事长篇如一本杂剧.....	(245)
四、张戒论杜与含蓄美的渊源特征	(253)
(一) 张戒对杜诗含蓄美的阐释.....	(253)

(二) 含蓄：艺术美的理想形态	(255)
(三) 从春秋笔法到含蓄之美.....	(258)
(四) 从诗贵含蓄到艺贵含蓄.....	(264)
(五) 含蓄之隐别于寄托之晦.....	(269)
五、《饮酒·其五》接受史与诗人风格的历时阐释.....	(275)
(一) 《饮酒·其五》接受史描述	(276)
(二) 陶诗风格的历时性阐释.....	(279)
(三) 阐释史与古代风格批评.....	(288)
六、陶渊明《饮酒·其五》集说.....	(292)
(一) 总评.....	(293)
(二) 诗旨.....	(295)
(三) 句释.....	(298)
(四) 诗章.....	(318)
 附 录	
一、参考文献目录	(323)
二、接受史研究论著简目	(332)

前 言

取得成功的研究和富有意义的进展的可能性，并不在于从任何可靠的常规学问中发现空白，而在于认识到一种可行的、但迄今很少用过的探询方向。

(尧斯《文学研究中的一场范例变化》)

这是一部探索、尝试之作。题为“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旨在借鉴接受美学的理论方法，以作为接受史料的历代诗话为学术基础，考察经典作品的接受史及其诗学意义。这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也是古典文学研究中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在此，对接受美学的引入和我国文学接受史研究的情况、接受史和研究史的区别、本书的学术追求和逻辑构架等，先作一交代。

接受美学(Rezeptionsästhetik)，又称接受理论或接受研究。它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联邦德国兴起的一种全新的文学研究范式，随即它在欧美各主要国家的学术界得到广泛的响应。接受美学不是美学中关于美的本质或美感心理形式的研究，也不同于文艺学中对鉴赏活动的研究；它是以现代阐释学和现象学为理论基础，以历史与现实的读者为中心，研究本文的接受历史和读者对本文的审美反应规律的理论流派。这也是对当时德国和整个欧美批评界走向极端的“语言中心主义”和“本文中心主义”的一种挑战。

接受美学的学者汇集于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故其又称为“康斯坦茨学派”。尧斯和伊泽尔是这个学派的主要理论家。尧斯的著

名就职讲演《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科学的挑战》(1967)和伊泽尔的著名讲演《本文的召唤结构》(1970),成为掀起这一文学研究范式转变运动的先导。10年之后,他们先后分别出版了《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1976)和《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1978)两部专著,并迅速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进一步扩大了接受美学在各国学术界的影响。

从尧斯和伊泽尔的论著情况看,他们虽被视为接受美学的双星,都把注意力从“作者-本文”转移到“本文-读者”的关系上,但各自的切入点和研究重心是有明显区别的。首先,研究起点不同。尧斯从文学史研究走向接受理论,而伊泽尔是从研究英美“新批评”和叙事理论走向接受美学的。其次,思想渊源不同。尧斯以现代阐释学为理论基础,受加达默尔的影响尤深。加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阐述的理解的历史性、合法的偏见、期待视野与视界融合及效果史原则等,在尧斯的理论中得到直接继承和运用;因而,英美学者认为,接受美学就是文学阐释学。伊泽尔以现象学美学为理论基础,受英加登的影响最深。英加登在《文学的艺术作品》等著作中提出的文学作品的多层次结构、图式化与不定点、具体化与具体化形态等,成为伊泽尔最基本的理论前提。最后,理论追求不同。尧斯认同理解的历史性,着眼于作品的艺术生命与历史上读者的关系,倡导建立一种把美学因素和历史因素联系起来的新型的文学史,即“从个别作品的接受史到整个文学的接受史”。在《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中论及“文学解释学”的双重任务时,尧斯重申了文学接受史研究的意义:“一方面,它必须说明文本的效果和意义所赖以具体呈现在当代读者面前的实际过程;另一方面,它要重新构造读者在不同时代以不同方式接受和解释同一文本的历史过程。这就要求在衡量一部艺术作品的现时效果时,必须参照早先人们对该作品的经验史,并且在效果和接受的基础上形成

审美判断。”(《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作者序言”)这就是说，接受史研究不仅有独立的学术意义，也是现时的审美判断的必要的历史前提。伊泽尔则发挥英加登文学本文的未定点在阅读过程中得以具体化的思想，系统分析了阅读过程中本文与读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的特点，建构了以读者阅读心理为重心的审美反应理论。因此，如果说尧斯的理论是一种宏观接受美学，那么伊泽尔的理论则是一种微观接受美学。

本书对接受美学的借鉴，当然主要是尧斯的宏观接受理论，即文学接受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泽尔的微观接受理论对本书作者没有意义；微观接受是宏观接受的基础，正是由于“本文的召唤结构”、“召唤”着一代又一代不倦的接受者，才使古代的经典作品和经典作家形成了绵延千百年的辉煌接受史。

接受美学的理论纲领、尧斯的著名就职讲演《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科学的挑战》一文，迟至 1987 年才在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一书中同中国读者见面。不过，接受美学正式引入我国并被用于我国文学的研究，当在 1983 年。这一年，我国几个重要的文艺研究刊物相继发表了有关“接受美学”的译文、评介和研究论文。如《文艺理论研究》(83.3)发表了冯汉津译意大利学者梅雷加利的《论文学接受》；《文学评论》(83.6)发表了张黎的《关于“接受美学”的笔记》；《文艺研究》(83.4)发表了张隆溪的研究论文《诗无达诂》；此外，钱锺书在完成于 1983 年的《谈艺录》(补订本)中也将“诗无达诂”与“接受美学”互为阐释。嗣后，接受美学日益得到我国学界重视，有关论著相继翻译出版。除上述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外，接着有伊泽尔的《阅读活动：审美响应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刘小枫选编的《接受美学译文集》(三联书店，1989 年版)及刘峰等编译的《读者反应批评》(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 年版)等。

随之,接受美学的理论方法也被广泛运用于古代文学和传统诗学的研究中。一般地说,伊泽尔的微观接受论多被用于发掘和阐释传统接受理论;而尧斯的宏观接受论则启发和开拓了古代文学接受史的研究。关于近年我国学界在接受理论和接受史研究方面的进展情况,可参阅本书附录“接受史研究论著简目”。相比而言,接受史研究的成果大大超过了接受理论的成果。从论文数量看,“简目”收录 1980 至 1997 年两类论文共 80 余篇,其中接受史研究论文超过 60 篇;从研究对象看,以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为主,同时也涉及戏剧、小说、辞赋等其它文体;从时间跨度看,以古代文学的接受史为主,又逐渐延伸到现代文学。如王卫平《论〈围城〉的三次接受高潮及其嬗变》,此文对于沟通几代《围城》读者的审美经验、深化对作品的审美接受极具意义;从研究规模看,有专题论文,有系列论文,也有学术专著。如果说高中甫的《歌德接受史》,是中国学者研究外国作家接受史的第一部论著,那么台湾成功大学杨文雄的《李白接受史研究》,当是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古代诗人接受史的第一部专著。

接受史研究已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中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不仅在较短时间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而且展示了广阔的学术前景。那么,在文学研究的学科体系中,接受史处在何种地位?接受史与创作史、批评史的关系如何?接受史与研究史又有何区别?

关于接受史与创作史、批评史的关系,朱立元、杨明在《试论接受美学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启示》一文中,设想“总体文学史”的写作时有较精当的分析,认为:“接受史或效果史是沟通文学史和批评史之间的桥梁;文学史提供基本素材;效果史主要历史地描述读者群体对作家作品反应批评;批评史则是效果史的理论概括形态,主要是对古代文学理论、观念、范畴、方法的历史考察。批评史提供了效果史形成的理论框架,效果史也从读者接受方面对文学史

的发展趋向产生制约作用。效果史既联接着文学史(对具体作家作品进行评析),又联接着批评史(由具体评析上升为范畴、命题、观念、理论),起着中介、枢纽的作用。如果能完成这样一部总体文学史,那将是一个新的贡献、新的突破。”在未来文学史研究中,是否需要把“文学史、批评史、接受史或效果史”三者“综合构成为庞大的总体文学史”作为奋斗目标,这可以继续讨论,也有待探索实践;但朱、杨二位对三者的学术特点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是颇为令人信服的,并在比较中充分阐明了“接受史”的独特学术性质和学术意义。

那么,接受史与研究史是一种什么关系呢?遗憾的是,朱、杨二位在上文中把二者混为一谈地“合流”了。在《启示》一文中他们写道:

除现行的文学史、批评史之外,还可就一部重要作品、一位重要作家以至某一时期的某一类文学作品(包括许多作家作品),考察当时和后世人们的反应、评论,考察其不同时代地位的升降和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从中窥探社会审美观念、价值观念的发展变化,并寻求其变化的原因。现在已有人写的《诗经研究史》、《鲁迅研究史》或许即可归入这一类……这一类“研究史”,从广义来说,似亦属于批评史的范畴,但其体例、写法又与现行的批评史不同。我们姑称为“接受史”或“效果史”。这是一项大有发展余地的工作。

“接受史”研究确乎是学术前景广阔、大有发展余地的学术领域,但其自有明显不同于旧有的“研究史”的学术品格,否则,就不必绕道从“接受美学”那里引进一个“接受史”的名目了。我认为,以尧斯的宏观接受美学为理论基础的“接受史”研究,同学术研究中作为前期准备工作或阶段性成果总结的“研究史”整理,其区别主要表